

湖湘文庫

〔清〕何紹基 撰 龍震球 何書置 校點

何紹基詩文集

一

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 岳麓書社

文庫

〔清〕何绍基 撰

龙震球 何书置 校点

何绍基诗文集

一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1214.92
H202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问 张春贤 周 强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虹
肖 捷 许云昭 戚和平 谢康生 文选德
孙载夫

组长 蒋建国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员 李凌沙 姜儒振 吴志宪 李友志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金则恭 朱有志 刘献华
钟志华 刘湘溶 彭国甫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李凌沙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员 唐成红 曾鹏飞 毛良才 刘国瑛
陈壮军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朱汉民 曾主陶 黄楚芳
委员 李建国 丁双平 汪 华 刘清华 黄一九
彭兆平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谢冠军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前 言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晚自号蝟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生于清嘉庆四年十二月初五日，卒于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享年七十五岁。

1

何绍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何凌汉，嘉庆十年中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尔后官至户部、工部尚书。服官四十年，品行端谨，办事勤慎。“平生服膺许郑之学，而于宋儒之言性理者，亦持守甚力”，“以文章道德系中外望者数十年”。其母廖夫人，家“世业儒而且耕”，幼时“智慧多能，勤力持正”。京居以后，仍常操持家务，布衣粗粝，持之终身。

何绍基的一生，经历了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这是清朝由盛而衰的时期。由于土地集中，农民破产，政治腐败，贪污成风，武备废弛，外寇入侵，致使内外矛盾日趋尖锐。川楚陕的白莲教，豫鲁冀的农民，湖广的瑶民，云贵的苗回民，广西的洪秀全，相继起义。这些连续不断的起义，特别是震惊中外、历时十四年、纵横十八省、被恩格斯誉为“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极其沉重地打击和动摇了清朝的腐朽统治，衰落的清廷从此一蹶不振，摇摇欲坠。

何绍基生活的家庭和时代，对他一生的影响颇大。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求学应考、任编修典乡试、简放学政和绝意仕进四个时期。

求学应考时期（道光十八年前）：何绍基于嘉庆四年与孪生弟绍业同降生于道州。两岁后因其父入都，随母至西乡小坪村，“就育于舅氏”廖辑侯，八岁时因其父中探花，随父母入都，濡染家学，就馆孙镜塘、张掖垣等师。他读书好求甚解，博闻强记，故能“汪洋汇众流，纵横恣谈敷”。十八岁应京兆试，取眷录，后补诸生、廪膳生。三十三岁取优贡生，三十七岁举乡试第一；次年恩科，廷对策“为长文襄、阮文达两师相及程春海侍郎所激赏，已置第一，旋以语疵抑落置十一”，“及成进士改庶常”，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三年后散馆一等，授编修。

担任编修典试的时期（道光十八年至咸丰元年）：何绍基任编修期间，历充文渊阁校理，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本衙门撰文教习庶吉士。道光十九年以副考官“典闽试”，道光二十四年“奉命充贵州副考官”，道光二十九年又以副考官“使粤东”，皆得士称盛。典闽试不仅得士称盛，而且诗情勃发，有《使闽草》传世。道光二十四年，又奉命充贵州副考官。甄拔“沧海蛟腾四十贤”，为黔中从来所未有，故于道光二十六年被提升为国史馆提调，负责处理馆内事务。因馆中例进书都只有一品二品大臣的传记，无三品以下传，何绍基任提调后，“因创拟条例，欲遍搜官书及前人文集补办国初以来三品以下各臣传，商之总裁穆相师，坚不见允”，于是他即日辞去了提调，由于此举得罪了权臣穆彰阿，道光二十九年使粤，何绍基仍为副考官。使粤归来，恰逢母亲去世，他悲痛欲绝。咸丰元年正月，葬母于长沙县北原丰坝之回龙坡。

简放学政时期（咸丰二年至五年）：咸丰二年服母丧毕，八月被简放四川学政。他力主整顿改革，使积习相沿、弊窦百端的考场得以整肃；文事之余，理民词讼，“平反命案枉死者十七人”，深得士民拥戴。因奉咸丰帝奕詝朱批，要他访察地方情形，“奏参总督、布政司、按察司、知府等员，置承审官七人于法，闾阎快之，咸以为天眼开”。由于满清政府对汉官并不充分信任，加之他不避权贵，结果，署督乐斌、总督裕瑞借河东土司争袭案联合对其弹劾；继因绍基“缕陈时务十二事”，被奕詝责以“肆意妄言”，最后由部议以“私罪”免去了他的学政官职。

绝意仕进时期（咸丰六年至去世）：何绍基免官后，游峨眉，登瓦屋，月余回省。出川后途经宝鸡至西安，游西岳华山和帝陵，后继续东下至山东济南，绝意仕进，先后在济南泺源书院和长沙城南书院主讲授徒，达十一年之久。同治九月经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丁日昌延主苏州扬州书局，校刊大字《十三经注疏》；浙江巡抚杨昌濬聘主孝廉堂讲席。同治十二年七月因患痢疾，终于苏州市寓。

何绍基是清代杰出的书法家。他以勤奋学书而著称于世。他的文钞中有关跋七卷，诗钞中也有一些金石考订之作，这是研究他的书学道路和书学理论的第一手资料，极其宝贵。

何绍基的学书道路，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学书初期、学书中期和学书晚期。初期与中期，以始写篆书为分界线；中期与晚期，以始学隶书为分水岭。

学书初期（二十岁以前）。这时他临摹的是颜真卿的楷书。

《忠义堂》颜帖，他全部手钩过，尤喜临摹《争坐位帖》。由于他的刻苦努力，坚持不懈，他所临摹的颜帖与颜真卿的墨迹极为近似。他后来考进士，在廷对策时，也以颜法书之，他这时的颜体功底已相当深了。

学书中期（二十岁至五十九岁）。他二十岁开始读《说文》，写篆书。这是他作为书法家在书学道路上的真正的起点。“余学书从篆分入手”（《跋国学兰亭旧拓本》）；“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跋道因碑拓本》）因此他对北碑特别喜爱。尤其向往北碑继承汉隶笔法，结构谨严，方整厚实，雄健挺拔的特色。为了找到更多的北碑，他到处访碑觅拓，购藏也很丰富，他访碑、觅拓、购藏，都是为了临摹，借以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穷日夜之力，悬臂临摹”，每次临摹，必使腰股之力，全部集中到指尖上，务必得到生气，才能成字。就这样，由于他“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臂如生驹，未肯就羁勒”，敢于改革，勇于创新；加以长期坚持，锲而不舍，“败笔纷纷不堪数”，他这时期的书法，已逐渐显示出独特的风格，在书苑这块阵地上已有相当大的影响了。他在四川学政期间，许多人请他写字，在四川民间和旅游胜地留下了许多墨迹。

学书晚期（六十岁以后）。何绍基被以私罪免去学政以后，他认为“人生荣华富贵变灭似云烟”，唯一的希望是自己的文字和书法能流传后世。因此，他在这一时期，除在山东济南泺源书院和长沙城南书院主讲授徒外，致力于许郑之学和书法艺术。何绍基经过初期、中期的长期艺术实践，深刻认识到“楷法原从隶法遗”，于是，他开始学习隶书，在书苑这块土地上进行了新的耕耘和追求。他这时已经六十岁了，“自立门户”的理想，“不能自己”的决心，使他不顾年迈，坚持拼搏。他自从学习隶书以来，每晨必课隶

数纸。其中《礼器碑》和《张迁碑》用功尤深，各临百通。

他晚年学书，不仅持之以恒，而且进而求不稳，求意境，求创造性，求个性发挥。这一点，马宗霍先生在《书林藻鉴》中说他的老师曾农髯曾称赞说，何子贞七十岁以后，“下笔时时有犯险之心，所以不稳；愈不稳，则愈妙”。因而能熔铸古人，另辟蹊径，自成面目，独具一格。他的篆书用笔遒劲，貌似枯藤，古拙典雅；他的隶书运笔浑圆，婉和韵雅，古拙朴厚，具有浓厚的金石味；他的楷书力厚骨劲，气苍韵遒，骏发雄强；他的行书恣肆旷逸，意态超然，有如天花乱坠，不可捉摹；他的草书龙翔凤舞，超迈入神，浑然一体，自成风韵。何绍基的这些书法成就，终于使他成为有清一代杰出的书法家。

三

何绍基不仅是清代杰出的书法家，还是有名的诗人。他少年时代即学为诗，弱冠时多拟古乐府，动辄数十韵。后虽应考、从政、致力小学与书法，然仍不废吟咏。他是道咸年间宋诗派的倡导者和重要诗人之一。

何绍基为何倡导宋诗？我们认为与清初以来诗坛的状况，及他的诗歌理论和思想倾向密切相关。

清初诗坛就有竞尚宋诗的呼声。《四库全书提要》云：“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乾嘉年间，赵翼、蒋士铨、翁方纲皆好宋诗。翁云：“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人而益加细密”；“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而在宋诗中，他认为“苏为宋一代诗人

冠冕”（《西洲诗话》）。他的《苏诗补注》进一步扩大了宋诗的影响。“道咸以来，何子贞、祁春圃、魏默深、曾涤生、欧阳确东、郑子尹、莫子偲诸老，始喜言宋诗。”（《石遗室诗话》卷一）尔后，曾国藩特尊黄庭坚，并以其政治影响加以推动，使宋诗派的影响更大。何绍基既然倡导宋诗，自然崇尚开宋代诗风的苏轼和黄庭坚。他认为：“坡诗洋洋海波注”，“七万字同星列附”。他诗集中用坡韵之作，累见不鲜；平生书写苏诗墨迹，亦颇多见。金天翮则在《艺林九友歌序》中说：“晚清诗人学黄最工者推何媛叟、范伯子。”何绍基认为：黄庭坚诗论中的“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的解释，“最精确”。由于何绍基等人的倡导，崇尚宋诗，风靡一时。

宋诗派本来是作为“诗必盛唐”的反对派而出现的一种诗坛风尚，意在“不蹈袭唐人”，而另辟蹊径。因此，他们的诗歌理论有别于清初王士禛的神韵说和清中叶沈德潜的格调说，而力主性情说。这一特点，我们从何绍基的诗论中看得很清楚。他说：“诗人诗自性情出”，“从古诗人贵性真”。而欲性真，则“平日明理养气于孝弟忠信大节，从日用起居及外间应务”去体贴，并且“时时培护，字字持守，不为外物摇夺”，“方才固结到身心上”，然后通过许多“法度”和“工夫”方能把真性情搬运到笔墨上。这样，诗才能“有字外味，有声外韵，有题外意”，才能“扶持纲常，涵抱名理”。后世见其所作，才能“如见其人，如见其性情”。此外，他认为：做诗“要从做人起”；要“读书阅事”；“必须胸有积轴气味”；必须“刻苦用一番精力”；用力之要在于“不俗”，“摆脱窠臼，直透心光”；诗贵“奇趣”、“闲情”和“一‘藏’字”；“不变则不进，不脱则不成”，等等。他的这些主张及其解说，无不体现其性情说和“忠孝节烈”、“温柔敦厚乃宗旨”。他

的这些理论，不仅与宋代苏轼的“述意达辞说”、黄庭坚的反讪谤重法度以及宋诗的基本特征相吻合，也与他终生恪守的封建正统思想及政治态度相一致。

何绍基的思想，其主流基本上倾向保守。他虽然对黑暗的现实多有认识，对生民的疾苦多有同情，并在四川学政任上力主整顿改革，然而，他的认识、同情和改革是有限的，并以巩固清朝的统治为其前提。他与龚自珍、林则徐有交往，与魏源是挚友，然而他与这些著名思想家相比，其思想差距却颇大。影响了他体恤民情思想的发展和对现实的洞察能力。由于他忠于清廷，故对农民起义，特别是对太平天国取敌视态度，对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和曾国藩等则由衷歌颂。又因其父深受宋儒性理的熏陶、黄山谷反讥讽的影响，以致他的诗作中“一切豪诞语、牢骚语、绮艳语、疵贬语，皆所不喜，亦不敢也”。因此，他的诗作贯穿着“温柔敦厚”的宗旨，不像龚、林、魏等进步思想家的诗作那样对社会富有批判力。

何绍基不仅倡导宋诗，而且是宋诗派的代表作者之一。他的诗歌，除弱冠所作落水丢失者外，今存诗集三十卷、词一卷，共两千余首。这些诗作，反映了他各个时期的生活经历、思想愿望、喜怒哀乐，可说是他一生的忠实记录。

由于何绍基幼历寒苦，晚岁家道颇艰，学政期间深谙弊端，晚年勇退，仍不忘世事，又由于他平生诚厚端饬，不畏权贵，慷慨敢为，而且深识古今成败得失，因此创作了一定数量的反映现实的作品。如《剗城》、《登舟》、《双洞溪左右铜厂不见一人》、《题沈小如丈津门拯溺图》、《普贤西向》、《金陵杂述》、《自浒墅关至虎丘》、《骡车谣》、《免海菜》等，这些作品，或揭露官府苛捐杂税之重，或鞭挞官场营私舞弊之丑，或写江河横流、旱

蝗千里之灾，或叙战后满目疮痍、民生凋敝之惨，或抒写对人民同情之心，反映出一个正直官吏的本色。何绍基不仅同情人民，还歌颂人民和一些为人民做了好事的官吏。如《葛镜桥》、《沪上杂书》、《题陈忠愍公化成遗像》等。前者高度赞美了葛镜“规度三十年，再建乃再圮”的顽强精神和“有桥伸若虹”的伟大成就。葛镜在麻哈江上的这一功绩，将随此诗而流芳百世。后者则歌颂陈化成死守吴淞炮台抗击英寇的献身精神和爱国行为。

何绍基平生好游，“世间千幽万奇境，几时到遍心始肯”。青少年时期随父游，壮年时期奉使游，老年时期闲暇游。除甘肃、云南、西藏外，其余各省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凡厥舟车所莅巨泽、名山、崇岩、邃谷，他人所不欲至不能至者，皆必穷其源，跻其巅而后止”，戴纲孙这些话一点不假，游峨眉必到山顶，“盘旋已至峨眉顶”；“孤峰而外都成海”。“举头一握是天庭，坐起颇闻天体腥。”使他感到“三尺吟肩万山里，尚无闲梦到封侯”（邯郸），“此身果在神霄里，笑煞人间问女牛”，到达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这使他得江山之助，写下了大量记游之作，如《游鼓山》、《游武夷》、《秦人洞》、《晨登飞来寺》、《登华顶》、《阳朔看山》、《桂林留别》、《飞云岩》、《佛光》等等。这类诗什，对特定山水的具体特征，描摹逼真，刻画入微。“山有尽时水又通，水欲穷时山又起”，武夷九曲，历历在目；“声声影影潭中含，潭静不动水面兰”，被郑珍誉为“插天一朵青芙蓉”的扶风山上的大潭美景，如在目前；“一弹指顷一隐现，深浅聚散成迷离”，罕见的峨眉佛光，通过诗人的描绘，使人一饱眼福；“象鼻临江趋且嗅”，“老君骑牛形佝偻”，素有山水甲天下之称的桂林风光，宛然在目。这些笔下的山川秀色，饱含着诗人对祖国锦绣山河的热爱和赞美，使我们今天能领略到这些名胜古迹当年的风

貌，对我们今天重建这些旅游点也大有借鉴参考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记游诗中，还有不少关心民瘼的内容，反映了他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感情。

此外，何绍基还有不少怀古感事、友朋唱酬、咏物题画、旅途见闻、衡文拔土、金石考订、书法探讨、情怀抒写之什。这些作品，“刚健，其性也；敦厚，其情也；繁称博引，见而洽闻者，其学也；道古谈今，明快而果断者，其识也”。性情学识如此，难怪乎时人盛赞其诗。

何绍基的诗歌，不仅内容颇有可取，而且具有明显的艺术特色：

淳真自然，如见其人。这是他的诗歌最突出的特色。他说：“吾之为诗，以达吾意而已”；“诗以意为主，韵为辅。句之佳者，乃时至气化自然流出，若勉强求之，则往往有椎凿痕迹”。故其“一生不做强颜词”。他的诗歌是他的性情的自然流露，不事矫揉造作。“寒雨连江又逆风，舟人怪我屡开篷。老夫不为青山色，何事欹斜白浪中。”（《逆风》）何等自然，不假雕饰。其他如《送孙镜塘师就馆滦州》、《出都四首》、《红豆》、《六月十二日》、《去蜀入秦纪事诗》等，无不如此。前人对其诗歌的这一特色早有定评：张穆云称读子贞之诗，“如见子贞之性情”；苗夔称其“自成骨貌”；邬鸿逵称其“真挚之言可弦可诵。”（《使黔草序》）

想象丰富，意境雅浑。何绍基说：“作诗文自有多少法度，多少功夫，方能将真性情搬运到笔墨上。”若不懂法度，不下功夫，就“不见得全能搬到纸上，所以古来名人不是都会诗文字画”的，作诗的法度、功夫很多，想象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何绍基的诗极富想象，有的想象格外奇特。《飞云岩》、《素心兰》为其典型代表。前者把游飞云岩所见之诸多怪石，切其岩名而喻之以云，

通过各种形象生动的比喻，特别是将人世间各种脸象予以物化，把奇形怪状的岩石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极富情趣。“寄语看诗读记人，我所道云都是石。”构思之巧，想象之奇，意境之雅，令人拍案叫绝。万青藜在《读子贞世丈飞云洞歌题后》中赞道：“君诗超妙浑无比，淋漓元气排空起”；尤赞该诗结尾“画龙点睛”之妙。林昌彝称：“《飞云岩》七言古一篇，倏忽变幻，鱼龙出没。”（《射鹰楼诗话》卷四）他前后写的三首《素心兰》亦称咏物之佳作。三诗所咏对象相同，而着眼点各异，意境迥别。前者着眼于“素”，次者着眼于“心”，后者着眼于“赏”。前二首作于道光二十四年，诗人正当旺年，锐意进取，欲为世用，后一首作于同治十年，反映诗人年过古稀，仕进之心冰消，追求淡泊的心境。其友藕舲云：“咏此花，惟心字难写出。”子贞第二首《素心兰》，不仅句句言心，且全拟人，意境雅浑，富有神韵，确实高出一筹。

不名一体，富于变化。朱琦评何诗云：“其所为诗，不名一体。”综观其诗，古体、近体，律诗、绝句、五言、七言、杂言等，各种形式齐备。大体说来，青年时，诗句多富变化；老年以后，诗句渐趋整齐。其诗虽宗陶、李、杜、韩、苏、黄诸大家，然非专似一人，只是“自成为吾之诗而已”。其诗笔端狡狯，素受称赞。苗夔曾叩之曰：“子于注疏说文及史志金石之学，用心勤矣！何以作诗能笔端狡狯变化如此？”子贞曰：“作诗必是诗，定知非诗人；然则作诗必诗人，讵得为诗乎？”其论深富哲理，然正道出个中奥秘。林昌彝赞其“下笔如潮如海，胸次高旷浑穆”。（《射鹰楼诗话》卷四）何诗随境触发，横览万象，广博衍奥，兀傲雄浑。如《北望》之平实，《飞云岩》之洒脱，《六月十二日》之深沉，《题陈忠愍公化成遗像》之慷慨，《补竹》之自然，《玉笋堂诗》之天趣，等等，笔端所到，无不境与意谐，浑然成趣。

语言朴实，明白晓畅。何绍基云：“诗是自家的，便要说自家话”；“将一切牢骚语、自命语、摹古语、随便语、名士风情语、勉强应酬语，概从刊落，戛戛独造，本根乃见。”而要达到这一步，并非易事。他曾书一条幅云：“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历处。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语耳。古人能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不可不知其曲折也。”此虽书山谷之文（《答洪驹父书》），然其平生作诗，确可以说自家语律已。他乘火轮船游澳门香港，往返三日，水程二千里，这使他大为惊叹。“火激水沸水转轮，舟得轮转疑有神”，“不帆不篙惟恃炉，炉中石炭气焰粗”，这都是不折不扣的自家语。此外，他还广采俗语、口语入诗，如“自鸣洋钟将报十”等，语言生动有趣。然而，这不是他作诗不重锤炼。“晴梳两岸雪，寒皱一江烟”；“春江化作莺花海，水面翩翩万蝶来”等，可称字琢句磨，用语之贴切，设喻之罕特，形象之生动，令人击节称妙。苗夔评其诗说：“平日之诗作，未尝苟作，命意措词，必有自立处。”确是如此。

当然，由于何绍基出身封建家庭，长期濡染家学，严守庭训；平生致力诸经说文考订之学，主张诗文中不可无考据；加之终究长期过的是“凉宵命酒，伏案围棋，明窗小楷，击楫高歌”的生活，与人民群众接触较少，因而给他的诗歌带来一些局限。主要是题材比较狭窄，多属日常生活、登陟山川、朋友应酬之作，反映社会现实的很少，缺乏思想深度。有些诗特别是金石考订之作，形象性差，意境颇逊。还有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和咒骂农民起义之作占了一定数量。这些都是毋庸讳言的。但是，从他整个的诗作来看，其成就不容忽视，特别是他的抒情诗、山水诗和咏物诗，大多写得不错，而且不乏佳作。过去由于被其杰出的书法成就所掩，人们往往忽视其诗歌成就，今天我们也当给以应有的评价。

四

何绍基认为：“圣人之道，悉备于经”，一个人要立身行事，植矩度绳，则必须续汉宋儒先遗绪。又认为“文以载道”，而道“寓于志与事而已”，因此，文要适于用；否则，“道之寓焉者啬矣”。何绍基为文受桐城派影响，多数文章缺乏现实内容。然因其力主“人与文一”、“立诚不欺”，不为“矜奇吊诡及庸腐浮浅之文”，平生致力于诸经考订之学，故文中多能葆其性情与学识之本色。

12

何绍基有文集二十卷，三百余篇。以思想性而论，价值最高的是奏稿，其次是题跋，再次是部分记、杂著和为直系亲属撰写的传、祭文和寿序。其奏稿两卷共十四篇，如《请旨饬查川省捐输广额名数暨办理土匪事涉两歧并参将擅造关防需索骚扰折》、《请旨交议整顿考试力除弊窦折》等，客观上揭示了当时的黑暗现实，反映了作者忧国忧民和敢说敢为的品德以及办事认真负责的精神。其题跋七卷，共一百五十四篇，其中金石题跋如《程木庵藏竟宁铜雁足灯考寄六舟上人》、《校定阮氏积古斋款识释文》等，沿波溯源，考订精详，一字一画，剖析无遗，折衷至当。论书题跋如《跋崇雨舲藏智永千文旧拓本》、《跋魏张黑女墓志拓本》等，或言学书，或论书理，言简意赅，论述精绝。这些题跋，对研究清代考订之学和书学艺术极有价值。其记、杂著、祭文和墓志如《重修湘西万福桥记》、《与汪菊士论诗》、《先考文安公墓表》、《仲弟子毅哀辞》等，或叙事抒情，情境相生；或议论品评，剀切要害，或叙或悼，感人肺腑。此外，他的赋如《酸咸赋》、《富贵如浮云赋》，尚能反映一定的生活和感情；《新柳赋》、《雨丝烟柳欲清明赋》，写春景情趣盎然，勃勃而有生气。